

《资本论》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

雍 桂 良

《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它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花费了四十年的心血，在极为艰苦困难的环境里，经历了千辛万苦而写成的。在这部光辉的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科学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得出了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结论。这部伟大的著作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一百多年来，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一八六七年。其第二卷、第三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一)

《资本论》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寻求真理，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著述中，对马克思主义也有零星的、片面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介绍。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最先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一九〇六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及其学说，并首次提到《资本论》书名。一九一一年，天津出版的《维新人物考》一书中，专有一章谈马克思的，也提到了“其最著名著作为《产业》”，即《资本论》。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二期上，有《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第一次对《资本论》作了简介。同一时期里，孙中山先生在一篇讲演中，也曾介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这部巨著称誉为：集人类思想之大成。

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中国人真正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时，很快的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更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年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论文中首先宣传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并节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②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马克思在这里明确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作了天才的表述”（斯大林语）的科学论断，在同一时期的《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初的《东方杂志》等，多次把它介绍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竖排版）

②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于1859年。以后当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时，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概括到第一卷第一篇里。

到中国来。《晨报副刊》还连载了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最早的中译文。一九二〇年十月出版的《国民》杂志译载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这是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资本论》一书的部分中译文。这一年的三月，北京大学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的第一次大型活动，就是请李大钊同志讲《马克思经济学说》，主要是讲解《资本论》。也是在同一时期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天津，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就是在敌人的监狱中，他还积极热情的宣讲《资本论》，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里，一些阐述介绍《资本论》的书籍，如《马克思经济学说》（介绍第一卷，考茨基著，陈溥贤转译）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早期共产党人李汉俊同志译）也相继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对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起过很好的启蒙作用的。

（二）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为广泛。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就编译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其中就有《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党的上海书店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浅说》（任弼时同志等编）、《资本制度浅说》（山川均著，施存统译）等书籍。在《资本论》尚未正式中译出版前，主要是通过一些介绍性的书籍和讲解活动进行传播的。如上海大学的（学生）政治经济学课本就是博洽德的《通俗资本论》中译本。革命先烈恽代英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还曾专门写过一部系统介绍《资本

论》基本思想的讲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翻译室，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在李大钊同志的号召和支持下，翻译室的德文组就曾中译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并将译稿油印出版，进行传播。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时，认识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这以后，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大革命失败后不久，郭沫若、郭大力和侯外庐等同志都分别着手中译《资本论》，郭沫若同志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开始中译《资本论》；郭大力同志中译出《资本论》第一卷，但译稿不幸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所焚毁。

一九三〇年三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以《资本论》书名出版的中译本。为陈启修所译，他是依据一九二八年的德文考茨基版，并参照日本河上肇和宫川实的日译本而译出的，但全书只包括第一卷的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一九三二年，出版了潘冬舟的中译《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分册（包括第一卷第二、三篇）。次年，潘又中译了第一卷第三分册（包括第一卷第四篇），均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这是接着陈启修的第一分册继续中译出版的。一九三二年又出版了王慎明（王思华同志）和侯外庐同志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包括第一至三篇）；一九三六年，出版了第一卷的下册。并出版了上下册的合订本。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吴半农同志中译、千家驹同志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包括第一、二篇）。

与《资本论》有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一九三〇年五月至一九三一年底，仅一年半时间里，就出版了三种译本，其中

一个版本为郭沫若同志所中译。这些译本都多次再版。从一九二七年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后，介绍和阐述《资本论》的书籍就出版十种之多，其中也有中国人著述，如王思华同志的《大众资本论》（后改名为《资本论解说》）等。《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此众多的中译本在中国的出版，这说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景。

《资本论》全书三卷本，是由郭大力和王亚南二同志合译的。他们为了翻译《资本论》进行了几年的准备工作，系统的中译了几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及和《资本论》有关的著作，从一九三四年起重新开始翻译。他们是根据德文校正本，并参考了英文和日文版本译出的。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资本论》全书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八至九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资本论》的装帧是细纹米色布封面，居中套印着“资本论”三字的红带，看起来庄重美观。它的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第一版二千册很快售完，随后又付印了第二版。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曾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们的竭力阻挠和破坏。抗战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均被列为查禁书籍，译者、出版者常遭受迫害。如王慎明、侯外庐的中译本《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出版后不久，侯外庐同志就被北平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所以当时翻译出版经典著作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常常要采取各种方式加以伪装，以避免特务和汉奸的耳目。《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译出版也是这样。如有的译本将马克思写成英文名（Karl Marx）；译者署假名（王慎明、侯外庐的第一卷下册，署名改为玉枢和右铭）；出版者用托名（王、侯的中译本，上册虚构为“国际学社”，下

册署“世界名著译社”），《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书名缩写为《经济学批判》等等。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不敢公开查禁经典著作，但暗中仍然千方百计予以破坏、阻挠。即便是收藏经典著作，也难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迫害。但是，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不畏强暴，对《资本论》一书，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广泛传播。有些共产党人就是在敌人监狱里，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还在孜孜不倦的研读《资本论》。如监禁在南京监狱，后英勇牺牲在雨花台的原共青团无锡团委书记高文华烈士就是这样。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敌占区，同样没有传播和阅读经典著作的自由。经典著作是被查禁的，阅读经典著作要遭到逮捕以致被杀害。如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全书，其第二版书籍，从上海向内地运送经过广州敌占区时，全部损失掉了。以后几次向内地运送途中，经越南海防时，被法帝国主义者全部没收；在经香港时，英帝国主义者不准挂号邮寄等等。

《资本论》一书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才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在革命圣地延安，《资本论》及有关经典著作成为各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必读书籍。在干部中间，有的自学潜心研读；也有的组成“读《资本论》小组”集体研究，定期举行讨论会。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学习《资本论》的文章。一九四二年整风时，毛主席就说过：《资本论》不是很长的么，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注）号召大家要持之以恒，坚持学下去，一定能学懂学好。在整个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学习《资本论》兴趣十分浓厚自觉性很高。培养出大量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专门人材。同时，在延安的党的出版机构“解

（注），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5页（竖排本）

放社”，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一九三八年起，编译出版了一套“马恩丛书”。其中第六种是《政治经济学论丛》（王学文等译），书中包括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马克思底〈资本论〉》等。另外还中译出版了《恩格斯论〈资本论〉》及恩格斯的《〈资本论〉提纲》等。这都为进一步学好《资本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

解放战争时期，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全译本，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一九四八年又重印一次，共两千部，新印本大部分运往解放区发行。同年《资本论》全译本的纸型转到解放区，又在哈尔滨重印三千部。建国后，党和国家对《资本论》的出版和发行更为重视。一九五〇年，郭、王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三次重印，共印一万部，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郭大力同志为了使《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尽量作到准确完善和通俗易懂，曾两次修订全书译文。第一次校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一九五三年三月至一九六三年底，其第一、二卷重印了九次；第三卷重印了七次。第一次修订本出版后，郭大力同志仍不满意，又做出了第二次修订，经过六年时间，在有病的情况下完成了。第二次的最新校订本，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别于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出版，每册均发行十五万九千多册。

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由考茨基编辑，把它作为独立著作，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书名擅自出版。其中译本由郭大力同志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环境里把它译出，于一九四九年六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截止到一九五七年七月共重印了五次。一九五七年十

月又出版了译者的校订本。郭大力同志在第二次修订《资本论》译文后，又对《剩余价值学说史》根据德文新版本着手进行重译工作。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半瘫痪了，又处在“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下，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该书重译完毕。郭大力同志不幸于一九七六年病故，生前只看到重译本第一卷的出版。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将《资本论》列为第二十三卷至二十六卷，共四卷六册（《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列为第二十六卷，共分三分册）。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每卷均发行十三万册，同时《资本论》各卷及《剩余价值理论》也另出版了单行本。编译局的《资本论》中译本是根据德文版并参照俄文版译出的，也参考了郭大力、王亚南的合译本。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有关手稿，建国后也部分的译成了中文。如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为书名，由刘蒲然同志译出，人民出版社分五册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五年出版。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几个笔记本构成的，以《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为书名的中译文，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的1863—1865年的《资本论》新手稿，其中第一卷里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也由田光同志译出，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六四年出版。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还准备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补卷（第四十卷至五十卷），其中包括《资本论》的全部手稿

总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建国后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极力阻挠和破坏《资本论》的出版与传播。叛徒、卖国贼林彪就大肆叫嚣过《资本论》“过时”了，胡说《资本论》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

会的规律等等。这不仅说明林彪对马列主义,对《资本论》一窍不通,不学无术,也充分暴露了他仇视马列主义的卑鄙用心。“四人帮”同林彪一样,也是攻击和歪曲马列主义“过时”了、不“适用”了,《资本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云云,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拚凑一套修正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四人帮”还扣压《资本论》手稿中译文的发表,反对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学习《资本论》,致使报刊长期不能发表学习《资本论》的文章。他们如此疯狂《反对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其罪恶目的,就是不让人们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搞愚民政策,以达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资本论》并没有过时,在今天新长征中,它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让我们努力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学生革命运动的真实记录 《北大学生运动史》出版

这是北大历史系56级部分同学在二十年前编写的书。它记录了自“五四”至解放北大学生争民主、争自由的英勇斗争,内容较为翔实,对现代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有参考价值,对今天我国广大青年也有启发作用。此书在编写过程中曾访问过几十位当时学运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并利用了大量的革命文献和历史档案,保留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文献和访问资料。该书文笔生动,编排活泼。现在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鉴于第一版已售完,准备年内再印。

文 丁